

美国纽约南区地方法院

美国,

诉.

王雁平,

被告.

案件号23 Cr. 118-3 (AT)

代表王雁平的量刑备忘录

布兰登·F·奎格利
莎拉·里维斯
贝克-博茨律师事务所
(BAKER BOTTS LLP)
洛克菲勒广场 30 号
纽约市, 纽约州 10112 212 408 2520
brendan.quigley@bakerbotts.com

王雁平的代理律师

目录

初步声明.....	3
王女士的背景.....	4
I. 王女士在共产主义中国的成长经历.....	4
II. 王女士来到美国, 之后不久 [REDACTED].....	7
III. 本案对王女士的影响.....	12
适用法律.....	13
明显低于指导原则的刑罚是适当的.....	14
I. 王女士并没有从犯罪行为中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 事实上, 她为罪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14
II. 犯罪的其他特征不支持按照《指导原则》量刑.....	16
III. 低于指导原则的量刑被用在与被告情况类似的被告身上.....	18
IV. 王女士已因参与共谋而面临重大后果.....	24
A. [REDACTED].....	24
B. 王女士在大都会拘留中心(MDC) 的审前拘留.....	26
V. 王女士将继续因参与共谋而面临重大后果.....	29
A. 仅仅因为她是外国公民, 王女士在监狱管理局(BOP)的监禁中就面临着比情况类似的美国公民囚犯更严格的限制。.....	29
B. 王女士面临重大的经济处罚, 这些处罚可能会远远超出任何监禁时间, 但远超过她从犯罪中获得的任何个人利益。.....	33
VI. 王女士的重新犯罪风险低.....	35
结论.....	36

初步声明

在近四十年的时间里，王雁平 (Yvette Wang) 过着充实且守法的生活。她在中国的学业中表现出色，在法国获得了两个硕士学位，与大学恋人组建了家庭，并在中国一家领先的房地产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

那么，为什么王女士会出现在这里？她并非出于贪婪。与其他在本案中被告诉和未被起诉的人相比，她从郭组织获得的金钱利益微不足道。事实上，即使不考虑可能面临的长期监禁，她与该组织的牵连所付出的代价——无论是精神上、情感上还是身体上的——都远远超过了她所获得的利益。

事实上，在指控的阴谋开始的那一年，2018 年，王女士正处于一系列沉重的个人危机之中。

她与留在中国的丈夫和儿子完全断绝了联系。她的父亲在 61 岁这个相对年轻的年纪去世，而她无法参加他的葬礼。

这些事件使王女士持续担心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这些事件使王女士对安全部门和执法机构深感不信任。这些事件使她越来越依赖并忠诚于她的雇主。而且这些事件也影响了她的判断力。

王女士对自己的行为深感懊悔。但考虑到她除了拥有一份工作（该工作早于阴谋开始）外并未从犯罪中获得实质性利益，且她并未招揽投资者，她已经

受到了相当程度的惩罚，而且她将继续面临惩罚和高度不确定的未来。在这些情况下，尤其是与本地区类似于被告人所受的判决相比，一个低于《指导方针》的、少于 48 个月的刑期足够了，但不超过达到合法量刑目的所需的时间。

王女士的背景

I. 王女士在共产主义中国的成长经历

王女士现年 45 岁，1979 年 9 月 1 日出生于中国山西省朔州市。参见《判前报告》(PSR)第 92 段。

从许多方面来说，王女士的早期童年相对不错。她的父母结婚了，双方都是专业人士，为家庭提供了基本的生活所需，并倡导勤奋、忠诚和遵守规则的价值观。同上，第 92, 94 段。她还与外祖父母关系亲密，童年大部分时间都与他们在一起。附件 A (密封归档)，《阿德因卡-阿金苏勒-史密斯(Adeyinka Akinsulure-Smith)博士报告》(《阿金苏勒-史密斯 报告》) 第 3 页。

然而，即使在孩童时期，王女士就已经有了一些经历，让她对中国专制政府产生了持续性的疑问。特别是在王女士出生的那一年，1979 年，中国实施了限制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这项政策的执行非常严格且危险。¹在政策实施后不久，1980 年代初期，王女士的母亲怀上了第二个女婴。《判前报告》(PSR) 第 93 段。生育另一个孩子，尤其是女孩，会使王女士的家庭面临一胎政策下的严重惩罚。王女士清晰地记得她的祖父母在临近预产期前来到她家。在

¹ 《中国独生子女政策：政府对妇女和未出生婴儿的大规模犯罪，在非洲、全球健康和人权小组委员会听证会上的证词》，第 112 届国会第 105 页 (2011 年) (指出"中国每年有 1600 万例强制和胁迫堕胎，但如果计入售出的堕胎药数量，可能接近 2300 万例")。

这次访问中，她记得她的叔叔按住她，她的奶奶和一位妇产科医生按住她的母亲，她听到婴儿的哭声，看到她的奶奶把药片放进婴儿嘴里，随后是震耳欲聋的寂静。

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限制有所放松，如果家庭的第二个孩子是男孩，政策就会有所放宽。1986 年，王女士的母亲生下了王女士的弟弟 [REDACTED]，这是她唯一的手足。《判前报告》(PSR)第 93 段。王女士和她的弟弟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她经常把他列为她生活中的保护和激励因素之一。《阿金苏勒-史密斯 (Akinsulure-Smith)报告》第 3、7 页；《判前报告》(PSR)第 94 段。

此外，朔州是一个煤矿城镇，环境高度有毒。如下文所述，王女士的父母双亲都在相对年轻的年龄死于癌症。《判前报告》(PSR)第 92 段。王女士自己也长了一个肿瘤。同上，第 103 段。她相信家族中癌症频发是由于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朔州空气中充满毒素造成的。参见同上，第 92 段；附件 B (王雁平的信函) ("王的信函") 第 1 页。

尽管如此，在父母的鼓励下，王女士培养了强烈的工作道德感，并在小学取得了优异的成绩。15 岁时，她被录取到怀仁中学——一所著名、精英式且要求严格的寄宿学校。《阿金苏勒-史密斯(Akinsulure-Smith)报告》第 3 页。王女士发现怀仁中学的课程在情感和身体上都极为艰苦，她甚至目睹了一名同学自杀。*同上²

² 大约 30 年后，怀仁显然仍保持着其严格的声誉。就在几周前，《中国日报》报道了一名在宵禁后使用洗手间的学生被要求"自费打印 1000 份自我批评文件并在全校分发"。Quan Zhanfu, 山西一学校因严厉惩罚引发争议, 《中国日报》(2024 年 9 月 24 日)
<https://www.chinadaily.com.cn/a/202409/24/WS66f29b51a310f1265a1c4946.html>

她在怀仁中学接受的教育培养了她强烈的职业道德感，为她被录取到著名的山西大学铺平了道路，在那里她主修国际文化、文明和物流。《阿金苏勒-史密斯(Akinsulure-Smith)报告》第3页。在山西大学，她遇到了未来的丈夫 [REDACTED] [REDACTED]。他们主修相同的专业，在重叠的课程中相识。

他们的友谊通过共同的学术兴趣而增进，最终发展成为恋爱关系。他们发现彼此来自中国同一地区，这使得他们的关系更加紧密。同上第4页。

2002年毕业后 [REDACTED] 前往法国在一所法国学校教授中文，而王女士则回家照顾垂危的外祖父。2003年外祖父去世后，王女士也随 [REDACTED] 移居法国，并开始年里尔第三大学攻读硕士学位。《阿金苏勒-史密斯(Akinsulure-Smith)报告》第3-4页；《判前报告》(PSR)第109段。

然而，在2005年春天，王女士得知她的母亲在40多岁时就患上了肺癌。参见《判前报告》(PSR)第92段；《阿金苏勒-史密斯(Akinsulure-Smith)报告》第4页。王女士认为，这个癌症是由她母亲接触朔州地下煤矿的毒素所导致的。同上。癌症迅速扩散，她的母亲于2005年去世，享年49岁。《判前报告》(PSR)第92段。王女士回到中国参加葬礼，[REDACTED] 和他的家人都帮助支付了葬礼费用，并在王女士伤痛期间一直陪伴在她身边。然而，她的家人坚持要她回到法国完成学业。《阿金苏勒-史密斯(Akinsulure-Smith)报告》第4页。回到法国后，她在查尔斯·戴高乐里尔大学完成了硕士学位，然后又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完成了第二个硕士学位。同上。最终，王女士和她的丈夫决定回到中国，以便与家人团聚。同上。王女士和她的丈夫于2013年生下了他们唯一的孩子。同上。第5页。

王女士于 2009 年开始在北京盘古投资有限公司 ("盘古") 工作, 该公司由郭氏家族 所有。《阿金苏勒-史密斯(Akinsulure-Smith)报告》第 4 页; 王女士信件第 2 页。她最初担任口译员, 随后成为秘书。《判前报告》(PSR)第 114 段。她在公司继续晋升, 担任国际事务总监并在董事长办公室工作。同上。她的职位涉及定期出差和监督各种供货商、承包商和供应商, 以及监督沟通和物流。同上。她还管理所有者的资产。同上。在为郭氏家族工作期间, 直到她被逮捕, 王女士被视为一个关心同事的人。[REDACTED]描述她"非常有动力和关心他人, 总能给周围的人带来阳光和快乐。无论她在哪里, 那里总是充满温暖。在工作中, 她帮助同事一起进步, 在日常生活中, 她像姐姐一样关心周围的人。"D 证物 (来自 [REDACTED]的信) 第 1 页。一位曾在王女士手下工作的初级员工形容她"对公司里的许多人来说, 体现了完美的姐姐形象"。进一步说, "她温暖每个人的心, 让我们感觉像一个家庭, 在战斗中团结一致。"附件 Q (来自 [REDACTED]的信)。

II. 王女士来到美国, 之后不久 [REDACTED]

2015 年, 盘古公司派她和几位同事前往纽约, 原本计划是为期三到六个月的出差时长。王女士信件第 2 页; 《判前报告》(PSR)第 97 段。然而, 不久之后, 郭氏公司开始成为中国情报机构的目标。参见《判前报告》(PSR)第 97 段。王女士的一位同事在香港被绑架, 秘密转送到中国大陆, 随后失踪。《阿金苏勒-史密斯 (Akinsulure-Smith) 报告》第 4 页。

尽管王女士回到香港, 希望能与她在中国大陆的丈夫和儿子团聚, 但她未能如愿。参见王女士信件第 2 页。2016 年, 王女士的丈夫被中国安全人员拘留了 12 小时, 并被迫在未阅读的情况下签署文件。同上第 1 页。安全人员告诉王

女士的丈夫，如果她试图联系他，就必须报告。同上。最终，王女士的丈夫被迫与她离婚。同上。自2018年以来，王女士就再也没有与前夫或儿子有任何联系——没有照片，没有 FaceTime，没有 Zoom 视频。参见《判前报告》(PSR) 第 95 段；《阿金苏勒-史密斯 (Akinsulure-Smith) 报告》第 5 页。

认识到如果返回中国可能面临拘留甚至处决，王女士于 2017 年永久定居纽约。《判前报告》(PSR)第 97-98 段。几乎同时，"2017 年 5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派遣四名未公开身份的国家安全部 (MSS) 特工前往美国，试图强制将郭先生遣返回中国，这是'猎狐行动'的一部分"，这一阴谋最终被联邦调查局 (FBI)挫败。《美国诉郭案》，庭审记录，案件编号 23 Cr. 00118 (2024)，第 5132 页第 14-22 行 ("郭案审判记录")。

[REDACTED]

[REDACTED]的重压因王女士父亲的癌症而加剧，

该病最终夺去了他父亲的生命；此外 [REDACTED]
[REDACTED]；她还与丈夫和儿子关系疏远；以及因胃部肿瘤和严重出血，王女士自己也不得不住院治疗。王女士的电子设备频繁遭到黑客攻击，她和家人被篡改的照片被发布到互联网上，她还失去了对其中国和香港银行账户的访问权限。见王女士信函第 2 页。王女士以一种典型的委婉方式描述了这些事件，称其为“我生命中一些最艰难的时刻”。同上。

这些压力一直持续到她在本案中 被拘留。 [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

。 3

此外，从 2017 年左右开始，一个人（可能是在中国情报机构的指示或鼓励下）开始对王女士进行在线和当面的指控，包括此前发布了一段据称是郭先生和王女士发生性关系的录音。参见《王诉熊案》(Wang v. Xiong)，纽约县索引号 157786/2019，纽约州法院电子档案第 1 号文件第 33 段；另见同上纽约州法院电子档案第 47 号文件（发布保护令）（“保护令”）。2020 年 4 月，这个人通过王女士办公室一楼的窗户拍摄了她的照片，并将其发布在 Twitter 上。保护令第

[REDACTED]

[REDACTED]

1 页。几天后，他出现在王女士办公室外，开始拍摄她的照片并威胁要杀她。王女士报警，警察告诉她，他们"正在对被告进行持续调查"。同上第2页。在她报警后，另一个人出现并进行了相同的行为。之后，第一个人⁴在推特 (Twitter) 上发布了自己在王女士办公室外的视频，并鼓励其他人一起威胁王女士。(同上。)

骚扰和不实谣言一直持续到现在。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有保护令，此人还是出席了本案的取证听证会和王女士的认罪程序 (后来被联邦调查局特工和法庭安保人员带走) 。

[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 : 4

[REDACTED]

⁴ 我们很乐意向政府或法院提供相关的推特 (Twitter) 帖子。

由于没有家人的支持，而且王女士基本上处于无国籍状态，她从雇主郭先生及其家人那里得到了重要的情感支持，包括人身安全保护和交通。郭先生的家族企业盘古公司还帮助支付了王女士父亲的丧葬费用，当时王女士的父亲因癌症去世，享年 61 岁。《判前报告》(PSR) 第 92 和 95 段。王女士在美国没有亲人，也不能回中国，郭先生和他的家人对待王女士“就像对待家人一样”。王女士的信第 3 页。正如王女士所言，“除了尽力为郭家工作”，王女士还“对他们非常忠诚”。(同上。)

王女士的工作成了她的世界。她的同事称她为“一个心地善良、慷慨、坚强、勇敢的人”。附件 E (来自 ████████ 的信) 第一页; 她“总是不遗余力地支持身边的人，无论他们是朋友、家人、同事，甚至是陌生人”，她的“同情心和无私精神在[她的]社区广为人知，.....，赢得了许多人的尊重和钦佩”。附件 S (来自 ████████ 的信) 第一页; 她是一个“对每个人都真诚、发自内心关怀的”人。附件 F (来自 ████████ 的信); 和“善良、富有同情心”。附件 N (来组 ████████ 的信) 第一页 ████████ 描述了当 ████████ 生病时，王女士如何帮助她康复，并“不断检查我的恢复情况”。附件 O (来自 ████████ 的信) 第一页。

然而，这些持续不断的威胁还是给王女士造成了身体、精神和情感上的伤害。2018 年 3 月父亲去世后不久，王女士自己也开始头晕、昏厥，并被诊断出患有胃部肿瘤。同上，第 103 段。如上所述，在王女士住院期间，郭先生的女儿负责管理她的个人事务，并每天陪伴在她身边。

王女士在中国的家人也不断受到威胁。在王女士离婚和她父亲去世后，当局将注意力转向了她唯一幸存的亲人她的弟弟，几年来多次与他联系，询问王

女士的下落以及她与郭先生的往来。

。同年早些时候，王女士的弟弟被捕，他的家被搜查。王女士的信第一页。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逐渐减少了与王女士的联系。她被捕后就再也没有和他联系过。

自己和家人承受的持续恐惧让王女士不堪重负，王女士甚至在被捕前就已经被诊断出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慢性心理创伤。《阿金苏勒-史密斯 (Akinsulure- Smith) 报告》第 3、14 页。

III. 本案对王女士的影响

在本案中被捕后的 19 个月里，王女士一直被关押在大都会拘留中心 (MDC)，这加剧了她的精神和情绪健康问题。参见《阿金苏勒-史密斯 (Akinsulure-Smith) 报告》第 13 页。一位联邦地区法官最近恰如其分地将这 19 个月中的大都会拘留中心 (MDC) 描述为一个“充满混乱和不受控暴力”的地方，这可归因于“对该设施的监管严重缺失、秩序混乱，在其范围内无法无天的环境，都构成了不可接受、应受谴责和致命的管理不善”。(《美国诉科卢奇案》 United States v. Colucci, No. 23 Cr. 417 (GRB), 2024 WL 3643857, at *4, 6 (纽约东区法院，2024 年 8 月 5 日))。自 2024 年 3 月以来，在王女士临近受审期间，大都会拘留中心 (MDC) 发生了多起“灾难性暴力事件”，包括至少两起杀人案、多起刺伤案和一起导致眼窝骨折的袭击案。(同上，*5。) 2024 年 6 月，一名囚犯在一次因毒品引发的争吵中颈部被刺，不幸身亡。六周后，另一名囚犯在一次肢体冲突中丧生，导致监狱大面积封锁。(同上，*5-6。) 尽管经常被关禁闭，也没有近亲探视，但王女士没有任何违纪行为，《判前报告》(PSR)

第 8 段, 并与大都会拘留中心 (MDC) 工作人员保持了总体上积极的关系。⁵

适用法律

根据最高法院在《美国诉布克案》(United States v. Booker, 543 U.S. 220, 245 (2005)) 中的判决, 《量刑准则》是提供咨询的。尽管“地区法院应在所有量刑程序开始时正确计算适用的《准则》范围”, 但《准则》仅仅是“起点和初始基准”《格尔诉美国案》(Gall v. United States, 552 U.S. 38, 49 (2007)) (内部引用和引文省略)。法院必须“考虑《美国法典》第 18 卷 § 3553(a) 的所有因素”, 并“根据所提交的事实进行个性化评估”。(同上, 49-50); 另见《美国诉多尔维案》(United States v. Dorvee, 616 F.3d 174, 184 (第二巡回法庭 2010 年))(量刑的合理性取决于“地区法院对法定量刑因素的个性化应用”, 而不是“量刑程度偏离适用准则范围”)。

这些法定量刑因素包括: 犯罪的性质和情节以及被告的历史和特征; 犯罪

⁵ 政府曾辩称, 在王女士被捕后的几周内, 她利用之前的律师“传递她的请求”, 从一个 G Clubs 的邮箱中获取“诈骗所得资金”。政府 2024 年 3 月 31 日致法院的信函, 电子文档提 (ECF) 第 255 号, 第 11 页。该理论主要基于 G Clubs 的一名员工与第三方 (即并非王女士或她之前的律师) 的一系列混乱且充满道听途说的录音, 该员工(i) 显然拒绝归还 G Clubs 信箱的唯一一把钥匙 (里面显然有两张价值 700 万美元的支票, 这些支票不是来自投资者, 而是来自在前几周关闭了 G Clubs 账户的银行), 同时 (ii) 该员工极力让第三方做出有罪的录音陈述, 以讨好政府。最终, 根据政府提供的证据, 似乎有第三方告诉该员工他不需要归还钥匙。

可以肯定的是, 王女士并不否认, 去年, 在她突然被捕和被拘留后的几周内, 她同意采取措施协助某些实体继续履行其对剩余员工和其他人的义务。例如, 见 GXVI101 (电子邮件主题“雁平签署的书面同意书” (“Written Consent Sighed [sic] by Yvette”))。然而, 当时王女士并未被指控与 G Clubs 或 GTV 以外的任何实体有关的任何实质性罪行, 政府也尚未指控“郭氏企业”的存在。如果说多位律师 (包括多位杰出的白领律师协会成员和前联邦助理检察官) 在相关通信中公开提及王女士签署了同意书 (见, 例如, GXVI101), 他们最多进一步表明王女士在签署同意书是蓄意努力的一部分, 即“甚至在大都会拘留中心 (MDC) 内也在经营敲诈勒索企业”, (2024 年 3 月 31 日政府给法院的信, 电子文档第 255 号, 第 11 页), 即使事后看来, 更利己和更谨慎的做法可能是完全退出她参与的实体的任何角色。

的严重性；促进尊重法律和提供公正惩罚的必要性；一般威慑考虑；保护公众免受被告进一步犯罪的影响；提供教育或职业培训、医疗保健或其他矫正治疗；可供选择的刑罚类型；以及避免不必要的差异。《美国法典》第 18 卷第 3553(a) 条。法院必须“判处足以但不超过必要刑期的刑罚”，以符合量刑的目的。(同上 (着重部分由作者标明))。

明显低于指导原则的刑罚是适当的

I. 王女士并没有从犯罪行为中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事实上，她为犯罪行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在考虑该犯罪的性质和情节时，重要的是，在一个涉嫌大规模挪用和转换投资者资金的案件中，王女士除了从她之前的工作中获得工资之外，没有从该犯罪中获得任何实质性的经济利益。《判前报告》(PSR) 第 14 段。⁶王女士的工资从 2019 年的约 231,900 美元到 2021 年的 313,961 美元不等。⁷值得注意的是，王女士在共谋开始之前为郭氏家族工作了近十年，所担任的职务并不涉嫌犯罪。即使在被指控的共谋期间，她参与的公司实际上还存在，并有员工和正常运营，尽管涉嫌挪用投资者资金。例如，见郭庭审记录 2987 (政府证人林玛丽-雷耶斯 (Linmarie Reyes) 的证词称，她在 G Gclubs 工作时认为这是一家“合法企业”，享受了医疗保险，工资通过银行直接存款支付，并与其他 14 名员工一起工作)；(同上，证词 3664:7-12) (杰西-布朗 (Jesse Brown) 的证

⁶ 虽然政府之前援引了王女士据称分配到的喜马拉雅交易所 (Himalaya Exchange) 加密货币，但政府也声称加密货币没有价值、不真实、流动性差，因此不存在任何关于分配给王女士的加密货币是王女士的某种利益的说法。

⁷ 见 GXBR0156 页 5699 段 (2019 年的 W2)；GXBR0147 页 428 段 (2020 年的 W2)；GXBR0115 页 671 段和 GXBR0150 页 469 段 (2021 年的 W2)。

词，称他相信喜玛拉雅交易所是一家“合法企业”）；GXBR0156（2019年W-2显示纽约金泉公司（Golden Spring New York）约有40名员工）；GXBR0014（2020年的W-2显示GTV大约有40名员工）。政府显然也没有将这些雇员的工资视为不义之财，这一点可以从政府没有要求没收支付给哈立德先生（Khaled）、雷耶斯女士（Reyes）或其他与政府签订不起诉协议的证人的工资这一事实中得到证明。

即使算上她从GTV募集活动中获得的30,906美元“董事费”，《判前报告》（PSR）第57段，⁸与她被指控的共谋和其他未被指控的个人从该骗局中获得的利益相比，这笔薪水也只是一小部分。政府指控郭用从受害者那里获得的钱购买了价值2650万美元的豪宅、价值350万美元的法拉利跑车、价值440万美元的布加迪跑车和价值3700万美元的游艇等。《判前报告》（PSR）第14段。余建明（William Je）将大约1,000万美元转入个人银行账户，（同上）政府的总结专家证人在郭的审判中作证说，余及其实体从该计划中获得了超过5亿美元的净收入，GX Z-26第34页。

王女士从该骗局中获得的经济利益也少于其他许多未被起诉的个人。未被起诉的商业银行（Mercantile Bank）留存了500万美元的投资者资金，用于聘请律师，同时还为赛车赞助提供资金。见郭庭审记录2887:10-11，2888:20，2889:17，2890:16-23。未被指控的郭强（Milesen Guo）从G Clubs获得了超过1亿美元的贷款，以及其他好处。（同上，2991:2-20）未被起诉的海曼资本管理公司（Hayman Capital Management）保留了200万美元的管理费。（同

⁸ 至少还有三名未被起诉的人，[REDACTED]，收到同样的董事费，GXSM - 073；GXSM - 178；GXSM - 187，政府显然没有要求没收这笔酬金。

上, 891:2-7) 未被起诉的海塔姆-哈立德(Haitham Khaled) 还保留了 270 万美元的投资者资金, 他将这些资金转入个人账户, 然后用于购买七处豪华房产。

(审判记录 2035:15-2036:1 , 2319:11-2320:24。) 值得注意的是, 王女士 2022 年之前的工资低于支付给哈立德 (Khaled) 的 350,000 美元 ,(见同上 , 1923:10-15)。简而言之, 王女士并没有从犯罪中获得任何实质性的经济利益, 除了她在共谋开始之前实际从事的工作的工资。

II. 犯罪的其他特征不支持按照《指导原则》量刑

除了她没有从犯罪中获得实质性利益 – 事实上比其他未被指控的人获益更少-- 这一事实之外, 犯罪的其他情节也不支持按照《指导原则》量刑。

首先, 王女士没有参与任何欺诈计划的核心活动--招揽投资者。在回应辩方就《判前报告》(PSR) 提出的反对意见时, 政府也承认了这一点, 并后退到了共谋者“对所有共谋活动负责”的观点上。见《判前报告》(PSR) 第 42 段; 另见同上, 第 41 段。虽然作为证据法或实体刑法的问题, 这可能是正确的, 但在量刑方面却过度证明了这一点。否则, 每个共谋中的每个被告都应被判处相同的刑罚, 而事实显然并非如此, 这与第 3553 条所要求的个性化判定背道而驰。一般参见笔录, 《美国诉克鲁皮案》(United States v. Crupi, No. 10 Cr. 228 (LTS) (纽约南区法院 2014 年 12 月 15 日) 电子文档 1478 号第 80 页) 电子文档第 1478 页第 80 行 (斯温 (Swain) 法官在对参与“世界上最大规模庞氏骗局”的被告进行判决时强调, “我是在对一个人进行判决”, 而不是对实施骗局的机构或其他共谋者进行判决)。

其次，虽然王女士同意作为“涉及五名或以上参与者或范围广泛的犯罪活动的[管理者或主管（但不是组织者或领导者）]”的条件而被加重三分，⁹但作为认罪协议的一项条件，必须注意王女士同意加重三分的含义和非含义。只要犯罪活动总共涉及“五名或五名以上参与者”即可适用；换句话说，它并不要求王女士主管五名或五名以上参与者。相反，“被告甚至不需要知道其他参与者，也不需要是一个以上参与者的组织者或领导者，就可以适用”，¹⁰并且被告本人也被视为参与者，见《美国诉帕乔内案》（*United States v. Paccione*, 202 F.3d 622, 625（第二巡回法院，2000年））。（与“我们的姐妹巡回法院之间的明显共识”一致，认为“在确定是否有五个或更多人参与有关犯罪活动时，可以将被告包括在内”）。事实上，在此案中，政府显然决定不指控任何从属于王女士的共谋者，王女士充其量只是其他低级“参与者”或非参与者的主管。

事实上，再次强调，虽然我们对认罪协议中规定的加重处罚的适用没有争议，但郭案的审判记录也显示王女士在共谋中从属于其他人，并被其他人否决。政府在郭案的庭审总结中首先播放了一段2021年4月28日的对话录音（GX-417/417-T），用政府的话说，在这段对话中，王女士“恳求”（郭案庭审记录5884）郭先生将G Clubs的1亿美元资金转移到国外，但遭到否决。（GX 417；郭庭审记录2047:4-12）。值得注意的是，王女士被排除在哈立德先生记录的后续会议之外。例如，参见GX 404，405，408，408，411，412，413；郭庭审记录2047-2069。

⁹ 《美国法典》第3b1.1条

¹⁰ 美国判刑委员会，《关于防止和缓解角色调整的简介》，第5页（2023年），https://www.usc.gov/sites/default/files/pdf/training/primers/2023_Primer_Role.pdf

第三, 在考虑认罪协议中商定的妨害罪加重处罚时, 法院应考虑阿金苏勒-史密斯 (Akinsulure-Smith) 博士的意见 [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

III. 低于指导原则的量刑被用在与被告情况类似的被告身上

综上所述, 十年之久的刑期与近年来被判刑的情况类似的被告的刑期不一致, 即使是被判犯有更严重欺诈罪的被告。

例如, 就在几个月前, 拉姆斯(Ramos) 法官对伊琳娜-迪尔金斯卡 (Irina Dilkinska) 判处了 48 个月的刑期。见判决书, 《美国诉迪尔金斯卡案》(*United States v. Dilkinska*, 17 Cr. 630 (ER) (纽约南区法院 2024 年 5 月 2 日), 电子文档 653 号) 迪尔金斯卡 (Dilkinska) 女士是一名律师, 曾在一家营销和销售欺诈性加密货币的公司担任法律和合规主管, 该公司“从至少 350 万名受害者手中骗取了 40 多亿美元”, 即比本案指控的诈骗金额大得多。见政府量刑意见书, 《美国诉迪尔金斯卡案》(*United States v. Irina Dilkinska*, 17 Cr. 630 (ER) (纽约南区法院 2024 年 3 月 27 日), 电子文档 640 号第 6 页)。政府称迪尔金斯卡 (Dilkinska) 女士是欺诈案“核心圈子”的“重要成员”, “几乎从一开始就参与了.....

计划”，(同上，第2页)。与政府对王女士的指控类似，政府指控迪尔金斯卡 (Dilkinska) 女士“创建并管理空壳公司，用于以[另一名共谋]的名义持有财产、开设银行账户并洗白”该计划的集资。(同上。)与王女士一样，迪尔金斯卡 (Dilkinska) 女士“在.....计划中扮演的角色除了工资之外，似乎没有获得任何个人利益”。(同上，第5页。)

与王女士一样，迪尔金斯卡 (Dilkinska) 女士在庭审前根据认罪协议，对指控她共谋实施电信诈骗和洗钱的替代信息认罪。这为她的法定量刑设置了上限，根据《指导原则》规定的量刑范围为120个月。(参见同上，第3-4页。)此外，与王女士一样，迪尔金斯卡 (Dilkinska) 女士也同意了《指导准则》第3章规定的若干加重处罚，包括经理或主管人员的三分加重处罚，在不考虑120个月法定最高刑的情况下，《指导准则》规定的犯罪等级为43。(见同上，第4页。)此外，与王女士一样，迪尔金斯卡 (Dilkinska) 女士在审判前也被关押在条件恶劣的大都会拘留中心 (MDC)。(见同上，第3页。)

然而，与王女士不同的是，迪尔金斯卡 (Dilkinska) 女士是一名执业律师和合规专业人士，作为“守门人”负有道德和法律义务。(同上，第5页)(辩称“迪尔金斯卡 (Dilkinska) 滥用律师身份，违反道德义务，协助洗钱数亿美元”)。此外，正如拉莫斯(Ramos)法官在判刑时指出的那样，“我真的不明白是什么阻止了 [迪尔金斯卡 (Dilkinska)] 在该计划被摧毁之前离开”。《美国诉迪尔金斯卡案》(United States v. Dilkinska, 17 Cr. 630 (ER) (纽约南区法院 2024年5月2日), 电子文档654号第21页7-8行。)相比之下，王女士“离开该计划”的选择充其量是非常有限的。她在美国没有永久的合法身份，在这里缺乏社会关

系和职业关系，如果回到中国，她将立即面临拘留（并可能被中国安全部门从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引渡回中国）。

在这种情况下，拉莫斯(Ramos)法官判处迪尔金斯卡(Dilkinska)女士 48 个月监禁。事实上，尽管迪尔金斯卡(Dilkinska)案中涉及的阴谋价值数十亿美元，但该案中只有六名被告之一，即该阴谋的共同创始人，被判处 120 个月以上的刑期。(参见同上，第 304 页。)

即使在“史上最大的已知欺诈案”，¹¹即伯纳德-麦道夫 (Bernard Madoff) 骗局中，斯温(Swain)法官也判处一名参与该骗局长达数十年之久的关键参与者 72 个月监禁，即《指导准则》规定的 120 个月“范围”的 60%。¹²该骗局的损失估计为 175 亿美元，被告乔安妮-克鲁皮(Joanne Crupi)数十年来“构建虚假的可转换套利交易”、“倒签交易”、“编造……文件和其他误导性答复供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在自己的账户编造损失……”，“在她自己或家人的账户上获得了超常回报，而这些回报都是倒签的虚假交易的产物”。参见量刑记录，《美国诉克鲁皮案》(United States v. Crupi, No. 10 Cr. 228 (LTS) (纽约南区法院，2014 年 12 月 15 日)电子文档 1478 号第 29、80-82 页。)克鲁皮(Crupi) 女士个人也从该计划中获得了数百万美元，其中包括购买海滨别墅的

¹¹ 见《美国政府与量刑有关的法律补充备忘录》，《美国诉邦万特等人案》(United States v. Bonventre, et al., No. 10 Cr. 228 (LTS) (纽约南区法院，2014 年 8 月 20 日)，电子文档第 1124 号)。

¹² 见美国检察官办公室，纽约南区法院，《伯纳德-麦道夫(Bernard L. Madoff)欺诈性投资咨询业务的四名雇员因在这起大规模欺诈案中扮演的角色而在曼哈顿联邦法院被判刑》(2014 年 12 月 15 日)，<https://www.justice.gov/usao-sdny/pr/four-employees-bernard-l-madoff-s-fraudulent-investment-advisory-business-sentenced#:~:text=Madoff%20Investment%20Securities%20LLC%2C%20JOANN,sentenced%20in%20Manhattan%20federal%20court。>

270 万美元。(参见同上, 第 82-83 页。)

同样, 与王女士不同的是, 克鲁皮(Crupi)女士接受了审判, 她参与该计划长达数十年, 直接与散户投资者互动;¹³她本人也因为该计划获得了“非同寻常的回报。”与王女士不同的是, 她并不是在被外国政府列为目标时采取的行动, 她没有面临被驱逐出境的附带后果(以及潜在的政治监禁或处决), 她没有在等待判决期间在条件恶劣的大都会拘留中心(MDC)服刑超过 19 个月, 而且作为美国公民, 她有资格被安置在监狱管理局(BOP 营地)。(见下文。)

最后, 在 2020 年, 艾布拉姆斯(Abrams)法官对米歇尔-莫顿(Michelle Morton)判处了 15 个月的刑期, 她和王女士一样, 在最初被指控参与了一个范围广泛的欺诈计划之后, 在审判前不久承认了两项第 371 条共谋罪。见判决书, 《美国诉莫顿案》(*United States v. Morton*, No. 16 Cr. 371 (RA) (纽约南法院 2020 年 12 月 4 日), 电子文档 945 号)。莫顿(Morton)女士接管了两家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的投资顾问公司, 这两家公司负责管理“公交工人、码头工人、住房管理局工人和城市雇员等”的养老金。参见记录, 《美国诉莫顿案》(*United States v. Morton*, No. 16 Cr. 371 (RA) (纽约南区法院 2020 年 11 月 18 日), 电子文档 946 号第 32 页)。然后, 她不顾投资顾问员工的抗议,¹⁴用 4000 万美元的客户资产购买了同谋者提供的流动性较差的部落债券, 同谋者随后利用这些债券进一步实施其欺诈计划。与王女士接受责任不同, 莫顿女士在持续多年的诉讼中两次提出撤消认罪, 但均以失败告终。(同上, 第 34 页)(法院指出“在

¹³ 斯温(Swain)法官确实认为, 重要的是(与王女士一样)克鲁皮(Crupi)女士“并没有亲自积极地招揽投资”(同上, 第 86 页)。

¹⁴ 同上, 第 16、42 页。

这一点上，我认为她显然不愿意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尽管她很可能对人们受到的伤害感到懊悔”。¹⁵

简而言之，少于 48 个月的刑期完全在本地区对犯有类似行为的被告所判刑罚的范围之内。

事实上，即使是在重大欺诈案中亲自获利并向投资者作出虚假陈述的被告，其刑期也远远低于 120 个月。例如，一家电动汽车公司的前首席执行官特雷弗-米尔顿(Trevor Milton)在审判后被定罪，尽管适用的《指南》范围是 60 年监禁，但他在去年年底被判 48 个月监禁。见政府量刑意见书，《美国诉特里沃-米尔顿案》(*United States v. Trevor Milton*, 21 Cr. 478 (ER) (纽约南区法院 2023 年 12 月 12 日) 电子文档 315 号)。与王女士不同，米尔顿(Milton)先生“通过社交媒体、电视、印刷品和播客采访”，就公司的技术和工程进展“直接向投资公众”做出了虚假和误导性陈述。(同上，第 2 页。)举例来说，“为了让[样板氢动力车]看起来是在行驶，而实际上它根本没有运行”，米尔顿(Milton)拍摄了一段视频，“车辆被带到一个斜坡的顶端，然后滚下山坡”，然后对视频进行了篡改，使其看起来是在依靠自身动力行驶。(参见同上，第 5-6 页。)与此同时，米尔顿(Milton)还实施了一项并行计划，让一个人接受公司的股票，以便米尔顿(Milton)购买一个牧场。(参见同上，第 8 页。)这些阴谋“沿袭了米尔顿(Milton)数十年来不诚实，被他人指控虚假和欺诈性商业行为的悠久历史”。(见同上，第 2-3 页。)

¹⁵ 为了充分披露信息，奎格利(Quigley)先生在 2017 年末至 2019 年秋期间曾在莫顿案中代表政府，但在莫顿女士最终被判刑前一年多离开了政府部门。

相比之下，鉴于王女士在大都会拘留中心(MDC)的监禁条件、她没有资格在营地服刑这一事实(如下文所述)，以及她将在判刑后在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拘留所和中国度过更多监禁时间这一几乎可以肯定的事实，120 个月的刑期在绝对值上仅略低于最近加利福尼亚州北区法院对伊丽莎白-霍姆斯(Elizabeth Holmes)判处的 135 个月刑期。霍尔姆斯(Holmes)女士在审判后被定罪，她个人发表了危及受害者健康的虚假声明，谎称其公司销售的血液检测试剂盒可以获得准确的结果，以及各大制药公司已经全面评估了她公司的技术，而且她的公司正在与国防部合作。¹⁶这些言论导致其公司的检测试剂盒被广泛使用，结果导致被筛查癌症的病人、监测妊娠的妇女以及一名被误认为感染了艾滋病前体病毒的受害者得到了不准确的检测结果，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同上。)此外，这些声明还诱使投资者投资数十亿美元，导致霍尔姆斯(Holmes)女士自己公司的股票估值超过 40 亿美元。(同上。)与王女士不同，霍尔姆斯(Holmes)女士“在实施欺诈计划期间”一直独自生活，相对默默无闻，她住在价值 1,500 万美元的豪宅中，并乘坐泰拉诺斯(Theranos)公司支付的私人飞机旅行。(同上。)她获得了全国性的关注，成为《财富》、《福布斯公司》、《魅力》和《T：纽约时报时尚杂志》的封面人物。(同上。)简而言之，王女士与伊丽莎白-霍尔姆斯(Holmes)完全没有可比性，在此判处 120 个月的刑期将远远超过必要的刑期。

总结来说，少于 48 个月的刑期与有类似记录、被判犯有类似行为的被告的

¹⁶ 美国检察官办公室，纽约南区法院，《伊丽莎白-霍姆斯(Elizabeth Holmes)因诈骗泰拉诺斯(Theranos)投资者数十亿美元被判刑 11 年以上》(2022 年 11 月 18 日)，<https://www.justice.gov/usao-ndca/pr/elizabeth-holmes-sentenced-more-11-years-defrauding-theranos-investors-hundreds>

B. 王女士在大都会拘留中心(MDC) 的审前拘留

王女士的

一年半以上的判决前拘留时间，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无论拘留设施如何，都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一年半以上的时间是非常残酷的，本地区的一名法官形容大都会拘留所(MDC) 的设施“墙壁和天花板上有明显的霉菌，饮用水受到污染，害虫出没，老鼠粪便从暖通空调通风口掉落，淋浴间有蟑螂和苍蝇”。

(《美国诉查韦斯案》 *United States v. Chavez*, 710 F. Supp. 3d 227, 235 (纽约南区法院 2024 年))。¹⁹

除了恶劣的物质条件外，大都会拘留中心(MDC) 还经常发生暴力事件，导致几乎无休止的关禁闭。本周早些时候，美国纽约东区检察官办公室在五起独立案件中对九名大都会拘留中心(MDC) 囚犯提出指控，罪名是今年早些时候(即王女士被拘留期间)在 MDC 内发生的多起谋杀和袭击事件。²⁰这些指控是在纽

¹⁹ 举个最近的例子，上个月，当签名人探访王女士讨论本呈件的初稿时，探访室和周围区域在整个探访期间都散发着粪便的臭味。臭味如此刺鼻，以至于警卫都戴上了口罩，并要求签名人“报告”这种令人发指的“工作条件”。签名人联系了联邦辩护人的一名成员，他参与了与大都会拘留中心(MDC) 正在进行的诉讼。当这位律师向大都会拘留中心(MDC) 法律顾问谈及这个问题时，大都会拘留中心(MDC) 法律顾问回答说，她的办公室也有臭味。

²⁰ 见美国检察官办公室，纽约东区法院，《宣布对在布鲁克林大都会拘留中心犯下暴力罪行的囚

约东区法官加里-布朗(Gary Brown)在一份司法意见书中描述了他是如何通过审查密封文件、政府官方声明、司法意见书和新闻媒体报道，“发现了该设施内令人震惊的野蛮暴力事件”之后才提出的。《科鲁奇案》(Colucci, 2024 WL 3643857 at *4)(强调了大都会拘留中心(MDC)的“混乱、无法无天”); 《美国诉格里芬案》, (*United States v. Griffin*, No. 22 Cr. 408 (EK), 2024 WL 2891686, at *3) (纽约东区法院 2024 年 6 月 10 日)(“有大量文件证明, 由于暴力和暴力威胁以及其他问题, 大都会拘留中心(MDC)一直存在频繁封锁的问题”)。就在东区法院指控九名囚犯犯有谋杀和攻击罪的同一天, 它还指控一名大都会拘留中心(MDC) 守卫人员侵犯了公民权利, 因为他在都会拘留中心(MDC) 停车场追逐一辆汽车, 然后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向汽车开枪。²¹

此外, 囚犯往往需要法院的干预才能及时获得医疗服务, 即便如此, 法院的命令也常常被忽视, 以至于基本医疗服务的拒绝和拖延在大都会拘留中心(MDC) 已成为“家常便饭”。《查韦斯案》(Chavez, 710 F. Supp. 3d 第 234 页。) 这些问题往往归咎于过度拥挤和人手不足, 而且情况只会越来越糟, 因为截至 2024 年 1 月, 除了大都会惩教中心(MCC)关闭后的一段时间以及随后数百名新囚犯转移到大都会拘留中心(MDC)外, MDC 的囚犯人数是三年来最多的。(同上, 第 236 页。)

犯提出联邦指控》(2024 年 9 月 30 日), <https://www.justice.gov/usao-edny/pr/federal-charges-announced-against-inmates-violent-crimes-committed-metropolitan>

²¹ 见美国检察官办公室, 纽约东区法院, 《大都会拘留中心(MDC) 惩教官被控侵犯联邦民权》(2024 年 9 月 30 日), <https://www.justice.gov/usao-edny/pr/mdc-correctional-officer-charged-federal-civil-rights-violation>

- 22 页 6 行)。南区和东区的许多其他法官也批准了类似的变更或其他适当的赦免。《科鲁奇案》(Colucci, 2024 WL 3643857, 第 2 页)(自新冠大流行以来,“南区和东区的法官根据大都会拘留中心(MDC) 的监禁条件对被告减刑已成为惯例”);(内部引文省略); 见, 例如, 同上, 第 *7 页(判处被告九个月监禁, 除非监狱管理局(BOP) 指定大都会拘留中心(MDC) 为相关设施, 在这种情况下, 监禁期将改为家庭监禁); 《查韦斯案》(Chavez, 710 F. Supp. 3d 第 236 页)(认为“大都会拘留中心(MDC) 的条件构成了‘特殊原因’, 因此拘留包括[本被告]在内的大多数不构成逃跑风险或社会危险的被告‘是不合适的’”); 《格里芬案》(Griffin, 2024 WL 2891686 第*3 页)(基于被告在大都会拘留中心(MDC) 被监禁期间所经历的暴力事件以及随后在接受医疗护理方面的延误, 给予被告体恤释放); 《美国诉桑塔纳》(United States v. Santana, No. 22 Cr. 368 (VM), 2024 WL 2275037, 第*2 页(纽约南区法院 2024 年 5 月 2 日))(将刑期下调六个月, 以考虑到被告在大都会拘留中心(MDC)的监禁以及那里“相当于对囚犯施加更严厉惩罚”的恶劣条件)。总之, 王女士在大都会拘留中心(MDC)的 19 个月(比 迪尔金斯卡(Dilkinska)女士等待判决的时间多 5 个月)是特别具有惩罚性的, 因此有理由在此处采用“实质性差异”。

V. 王女士将继续因参与共谋而面临重大后果

除了因与郭先生及其实体有牵连而已经面临的惩罚之外, 王女士还将继续承受重罪定罪所带来的普通后果之外的重大后果, 而且很可能是终生的后果。

- A. 仅仅因为她是外国公民, 王女士在监狱管理局(BOP)的监禁中就面临着比情况类似的美国公民囚犯更严格的限制。**

首先，仅仅因为王女士是外国公民，尽管她在美国境内是合法居留的，但她将面临比情况类似的美国公民更为苛刻的监禁条件。监狱管理局(BOP)的规定禁止像王女士这样的非公民在最低安全级别的监狱营地(FPC)服刑，这通常留给“白领”罪犯。²²相反，这些规定要求她至少被分配到低警戒的联邦教养所(FCI)。见《监狱管理局(BOP)计划说明》5100.08，第50页。(将“可驱逐出境的外国人”描述为“非美国公民的男性或女性囚犯”，并要求此类“囚犯或长期被拘留者应至少被安置在低安全级别的机构中”)。

在低安全级别的联邦惩教所(FCI)的条件远比联邦惩教营(FCP)更为艰难和危险。联邦惩教营(FCP)收容的是服刑较短、行为一般良好、风险较低的囚犯。²³相比之下，联邦惩教所(FCI)常常收容的是那些刑期超过10年的囚犯，他们往往因涉及帮派活动、毒品或枪支罪、性贩卖等暴力犯罪而被判刑。²⁴此外，联邦惩教所(FCI)通常规模较大，且面临人满为患的问题。²⁵

本区域及其他区域的法官长期以来一直认识到对非公民所形成的判刑差异。

²² 例如，见玛德琳-哈尔珀特(Madeline Halpert)，《伊丽莎白-霍尔姆斯(Elizabeth Holmes)：德克萨斯州布莱恩联邦监狱营的内部日常》，BBC(2023年5月30日)，<https://www.bbc.com/news/world-us-canada-65625526> (描述了德克萨斯州布赖恩联邦监狱的条件，伊丽莎白-霍尔姆斯和其他囚犯一起被关押在那里，“其中大多数人因非暴力犯罪和白领犯罪而服刑”)。

²³ 2022年来自司法部的一份报告显示，在2021年共有73,459起囚犯犯下的“禁止行为”中，有1.5%发生在最低安全级别设施，而16.9%发生在低安全级别设施。美国司法部，《根据第一步法案收集的联邦囚犯统计数据》，2022年，第7页(2022年)，

<https://bjs.ojp.gov/sites/g/files/xyckuh236/files/media/document/fpscfsa22.pdf>

²⁴ 参见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GAO-12-743，《监狱局：囚犯拥挤情况的增加对囚犯、工作人员和基础设施产生负面影响》第27, 51页(2012年)(指出由于高度帮派活动，低安全级别设施可能发生暴力事件)。

²⁵ 在2011年，低安全级别机构的容量超标37%，而最低安全级别营地仅超标14%。同上，第52页。严重的过度拥挤“对联邦监狱局机构中的囚犯产生了负面影响”并“导致囚犯行为不端，这影响到工作人员和囚犯的安全与安保。”同上，第18页。

庭审记录,《美国诉康诺利案》(United States v. Connolly, 案号 16 Cr. 370 (CM) (纽约南区法院 2019 年 10 月 24 日) 电子文档编号 451 , 第 91 页第 4-12 行) (“[因]他是非公民, 他将无法像任何被定罪的美国公民那样服刑。这是不对的。”); 庭审记录,《美国诉科恩案》(United States v. Cohen,案号 19 Cr. 741 (WHP) (纽约南区法院 2020 年 6 月 9 日) 电子文档编号 48 , 第 42 页第 7-9 行) (承认“外国公民与类似情况的美国公民不同, 无法在惩教营或最低安全级别设施中服刑”, 无法判处已服刑期, 并无法实施家庭监禁) 。

第二, 与美国公民不同的是, 王女士服刑完毕后将 被移交给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 并在没有保释的情况下被拘留, 直到她的移民身份问题得到解决。参见《美国法典》第 8 篇第 1226 节 (要求在刑期完毕后对犯罪外国人进行拘留)。虽然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的拘留在技术上是“民事”的, 但毫无疑问这也是惩罚性的, 因为王女士被安置在那里是因为她的定罪, 而非非法身处美国。本地区的法官们也已经认识到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拘留对外国公民相比美国公民具有的不同、惩罚性的影响。庭审记录,《美国诉路易斯案》(United States v. Lewis, 案号 23 Cr. 370 (JGLC) (纽约南区法院 2024 年 4 月 4 日), ECF 编号 76 , 第 30 页第 10-17 行) (对承认内幕交易的亿万富翁判处已服刑期, 并指出, “因为路易斯先生是非公民, 他不能在任何刑期结束后简单地离开国家, 尽管他承诺自愿离开。相反, 他将被释放到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的监管下, 并被安置在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的拘留设施中, 这不仅会增加他的拘留时间, 几乎肯定会影响他正在进行的医疗治疗和医疗护理。鉴于此, 授予减刑是合理的。”) 。

此外，像大都会拘留中心(MDC)一样，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的拘留对王女士来说将是“艰难时光”。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的母机构——国土安全部的监察长在 2019 年描述了他的团队对 ICE 拘留设施的检查发现了“即时的风险或严重违反拘留标准的行为”，包括“在被拘留者的牢房中发现绳索、过度限制性的隔离、不充分的医疗护理、未报告的安全事件以及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例如“开封的生鸡肉包装”中“血液泄漏到整个冷藏设备上”。(见国土安全部监察长办公室，《关于在四个拘留设施中对 ICE 被拘留者的待遇和护理的担忧》，第 iii 页、第 4 页 (2019 年 6 月 3 日)，<https://www.oig.dhs.gov/sites/default/files/assets/2019-06/OIG-19-47-Jun19.pdf>。)监察长还观察到某些设施中的浴室“破旧和发霉”。(同上，第 iii 页。)

第三，如果王女士无法留在美国，她很可能会被遣返回中国，在那里她可能会面临进一步的监禁，甚至可能被执行死刑。鉴于在郭先生的审判中无可争议的证据表明，中国政府曾试图强行将郭先生从美国遣返回中国，很难想象如果王女士被送回那个国家会遭遇什么命运。法庭本身在郭审判期间的旁听中承认，众所周知中国政府是“可怕的、压迫的、专制的、极权的、可怕的”。(郭审判记录 5045 页。)中国监狱营的条件极其严酷，尤其是政治犯，他们常常“受到等同于酷刑或残酷、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的惩罚”。(《中国：对人权活动人士的重判是可耻的》，国际特赦组织 (2023 年 4 月 10 日) <https://www.amnesty.org/en/latest/news/2023/04/china-heavy-prison-sentences-for-human-rights-activists-disgraceful/>) (描述对人权活动人士的 12 年和 14 年刑期，他们在拘留期间“遭受酷刑和其他虐待，包括长时间的审讯，以及每天超过 10 小时被绑在铁‘老虎椅’上，肢体扭曲，持续

多日”)。作为 [REDACTED]，可能面临严重后果的王女士，酷刑“常被用作针对被视为对既定秩序构成威胁的人的政治压制工具”。(《人民共和国酷刑及虐待情况》，国际特赦组织，1996年4月第3页，<https://www.amnesty.org/en/wp-content/uploads/2021/06/asa170511996en.pdf>。) 有时这些酷刑实例以死亡告终。一份报纸，《河南法制报》，报道称在两年时间里，河南省有41名囚犯在审讯中死于酷刑，其中包括“受害者被绑起来悬挂，浇上开水，用瓶子打，用香烟烧，用皮带或塑料带鞭打，或在生殖器上放电棒”。(同上，第12页。)

简而言之，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王女士在释放后能够留在美国，她的关押条件也将明显更糟，而且（由于她被转交给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监管）她的监禁时间将比处于类似情况的美国公民更长。在最坏的情况下，如果她被遣返回中国，她可能面临的“刑罚”是该地区70年来没有对任何被告、任何罪行施加过的。²⁶

B. 王女士面临重大的经济处罚，这些处罚可能会远远超出任何监禁时间，但远超过她从犯罪中获得的任何个人利益。

王女士因其定罪面临的经济处罚——这远远超过了她不存在的个人收益——将会持续对她产生惩罚性影响。王女士同意的没收金额等于“大约14亿美元

²⁶ 本杰明·韦瑟和洛拉·法杜卢，《恐怖主义者审判可能使曼哈顿60年来首次判处死刑》，《纽约时报》(2023年2月12日)，<https://www.nytimes.com/2023/02/12/nyregion/saipove-manhattan-death-penalty-trial.html>（指出上一次在纽约州进行的联邦执行死刑，涉及一名在本区被定罪杀害联邦调查局特工的被告，发生于1954年）。

的一笔钱”。(认罪协议第 2 页。)

首先，毫无疑问，“大约 14 亿美元”的刑事没收金额是具有惩罚性的。参见《美国诉维洛斯基案》(United States v. Viloski 814 F.3d 104, 109 (第二巡回法院 2016 年)) (描述一个与特定罪行“相关联”的没收，“在需要对基础重罪定罪的刑事程序结束时施加”，并且不可能对一个无辜者施加”，这被视为“轻松符合惩罚性没收的定义。”(引号省略))。这里的没收性质因为王女士的有罪认罪后变得更加明确，因为政府的审判专家证人仅计算了进入 GTV、农场贷款计划、G Clubs 和喜马拉雅交易所的总资金为 13 亿美元。见 GX Z-26 第 1 页；审判记录 4320:25-32:7。²⁷虽然在 14 亿美元的背景下 1 亿美元的差异看起来可能不多，但这一金额（甚至其一部分）将会对王女士的未来产生实际影响，如下所述。

其次，相关地，如果被查封的特定财产与 14 亿（或 13 亿）美元的没收金额之间存在差额，王女士很可能是唯一可能用来满足货币判决的共谋者。余先生的公司净流入 5.5 亿美元——占 13 亿美元的**超过四成**——据信他目前安逸地在中东，没有任何进入美国法庭的可能，更不用说被要求支付任何没收判决了。郭先生的家族办公室和家庭成员净收入 1 亿美元，²⁸宣布破产并面临众多其他债权人，此外还可能面临漫长的刑期。因此，王女士，其薪资在数十万到百万之间，很可能成为唯一一个留下来承担可能高达数亿美元替代资产判决的人。

²⁷ 此外，正如审判证据所述：(i) GTV 的大部分资金流最终被偿还给了证券交易委员会，以及 (ii) 大约 1.5 亿美元流入 GTV 是来源于 Saraca 出售其现有 GTV 股份，见郭审判记录 5308-09 页（否决了政府的撤销动议）。

²⁸ GX Z-26，第 34 页。

简而言之，无论她还需要在监狱中服刑多长时间，王女士将在其余的生活中继续因这一罪行受到惩罚。可以肯定的是，她的关押条件将比处于类似情况的美国公民更糟、更长。她出狱后的生活不太明朗。但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她也很可能被一笔重大的货币判决（并可能被中共）追随至死，并且与仍在中国的兄弟和儿子隔离。在最坏的情况下，她在中国监狱中面临酷刑和潜在的死刑。

VI. 王女士的重新犯罪风险低

最后，根据《指南》的判决，甚至接近《指南》判决的判决，对于具体的威慑或保护公众免受被告进一步犯罪不是必需的。（《美国法典》第 18 卷第 3553(a)(2)-(B)-(C)条。）

首先，王女士对她的行为以及那些摧毁了她如此投入的运动的事件承担了“[REDACTED]”²⁹。她的选择是在持续的创伤背景下作出的，在那段时间里，她完全依赖她的工作和郭先生的家庭来获得保护、支持和友谊。王信函第 2-3 页。

现在，王女士是一个自我意识日益增长、感到懊悔并有动力改进的人。《阿金苏卢雷-史密斯报告》(Akinsulure-Smith Report)第 15 页。正如阿金苏卢雷-史密斯(Akinsulure-Smith)博士所指出的，她“[REDACTED]”[REDACTED]”。(同上，第 2 页。)王女士本人已表达对该计划的“[REDACTED]”，并且明白他们遭受的错过的机会和损

²⁹ 《阿金苏卢雷-史密斯报告》(Akinsulure-Smith Report)第 2 页。

失是“无法替代的”。(王的信函第 3 页。) 尽管经历了过去的挣扎，王女士在“坚定决心改正并解决[她的]错误”。(同上。)

其次，王女士在她的人生中有四十年作为一个生产力强、遵纪守法的社会成员，这应该让法院对她未来重新犯罪风险低有信心。她仅在 [REDACTED] [REDACTED] 以下情况才卷入此次犯罪：她父亲的去世、她丈夫的离婚，以及一场个人健康危机。

第三，如果有人担心她对郭先生及其组织的过去忠诚可能预示着未来的不当行为，实际上，郭组织已被中国政府的迫害、美国政府的起诉以及一起庞大的破产案件三连击有效摧毁，其中受托人实际上已花费数千万美元的费用追查其所谓的资产。 [REDACTED]

[REDACTED]。一项远低于《指南》范围的判决足以确保任何剩余的必要改变。

结 论

基于上述理由，特别是王女士在犯罪时的历史和特性，以及对犯有类似行为的被告所施加的刑罚，我们恭敬地提交，少于 48 个月的判决足以满足但不超过实现判决的合法目的所必需的。

日期: 2024 年 10 月 4 日

恭敬地提交，
贝克-博茨律师事务所(BAKER
BOTTS LLP)

签字: Brendan F. Quigley

布兰登 奎格利(Brendan F.
Quigley)
莎拉-里夫斯(Sarah Reeves)
洛克菲勒广场 30 号
纽约州纽约市 10112
(212) 408-2500
brendan.quigley@bakerbotts.
com

王雁平代理律师